

# 戰爭、權力與邊疆政治： 對1930年代青、康、藏戰事之探討<sup>\*</sup>

林孝庭<sup>\*\*</sup>

## 摘要

本文利用中、英文原始檔案，旨在探討發生在1930年代、向來較不為人所知的康藏與青藏戰爭，以及該時期康藏邊區各股不同政治勢力之間所發生的軍事衝突。本研究嘗試跳脫以往將這些西南邊界戰爭視為「英帝國主義所支持」的西藏與中國之間的對抗此一看法，或者是視這一系列衝突為中、英兩國競爭西藏下的一個結果。本文同時把南京國民政府、西南各省軍閥與西藏政府作為三個不同主體來看待，藉以重新建構與還原1930年代西南中國青、康、藏地區的政治、社會與軍事面貌；而藉由對這些發生在西南邊陲地區大小戰事的分析。本文也希望能夠對於「戰爭」對民國時期的中國西南邊疆議題、近代漢藏關係，與國民政府1930年代在中國西南的國家建構(state-building)與政權鞏固(regime consolidation)所帶來的意涵，做更進一步的探索與釐清。本文研究指出，1930年代西南中國的西藏、西康、青海軍閥與南京國民政府中央，彼此之間在政治上具有相當微妙的關係，而當時西南軍閥政權亦享有強大的

\* 本文的寫作，承蒙如下學者與學友的啟發與意見交換，作者在此深表感謝之意：劍橋大學Dr. Hans van de Ven、牛津大學Dr. Laura Newby, Dr. Rana Mitter, Dr. David Faure、牛津大學博士生林欣宜與許惇偉。作者亦衷心感謝近史所集刊編委會以及兩位置名審稿人，對於本文初稿所提出的指正與諸多有趣且重要的修改意見。

\*\* 收稿日期：2003年10月3日，通過刊登日期：2004年7月22日。

英國牛津大學博士，現為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舊金山大學環太平洋研究中心2004年Kiriyama訪問學者。

自主性，這些因素對於吾人分析 1930 年代西南邊陲地區的政治與軍事版圖，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本研究同時也欲指出，1930 年代西藏、西南軍閥及南京國民政府三方面，事實上對於「戰爭」皆有所需求，並且都期待、製造與利用戰事的發生，以藉此帶給各自政治勢力在軍事、政治與財政上的有利作用。在這場 1930 年代中國西南地區的軍政勢力角逐的過程中，青海的馬步芳與西康的劉文輝可說是贏家，西藏政府則失去了自民初以來在康區所保有的領土與軍政優勢，而蔣介石所代表的國民政府，雖利用戰事的發生，以種種名目欲將中央勢力帶進西南邊陲，然而直到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其終究未能在此一地區建立起有效與牢固的統治。

關鍵詞：國家建構、康藏戰爭、青藏戰爭、達賴喇嘛、國民政府

## 前 言

長久以來，有關「戰爭」與近代中國社會之間的關係，一直都是西方學術界相當關注的一個研究主題。<sup>1</sup>近年來，此一研究命題進一步延伸到「戰爭」對近代中國的國家建構(state-building)中所帶來的影響，並且從此一角度來看「戰爭」與「軍隊」對於近代中國的社會動員、基層組織的建立，與國家行政系統強化所帶來的積極意義。<sup>2</sup>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從清朝中葉以來，「戰爭」就成為近代中國歷史的一個主要特徵與嚴肅的課題；回顧歷史，百餘年來，中國對外有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與八國聯軍之役，對內則有太平天國之亂、捻亂與回變等。到了民國時期，在中國境內所發生

<sup>1</sup> 傳統上對於此一命題的研究，強調「戰爭」在近代中國社會往往扮演「最終裁決者(final arbiters)」的因素，成為不同政治與軍事團體之間，彼此爭奪與分配政經社會資源的一個最常見的手段。此類研究可以 Lucian Pye 為代表，見 Lucian Pye, *Warlord Politics: Conflict and Coalition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Republican China*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71).

<sup>2</sup> 近幾年來西方學術界有關「戰爭」對近代中國國家建構與社會塑造影響的研究，以 Hans van de Ven 最具代表性，見氏著，“The Military in the Republic,” in Frederic E. Wakeman, Jr. & Richard L. Edmonds, eds., *Reappraising Republican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98-120, 以及 Hans van de Ven, ed., *Warfare in Chinese History* (Leiden: Brill, 2000). 對於近代中國戰爭的其他相關研究，可另見：Bruce A. Elleman, *Modern Chinese Warfare, 1795-1989* (London: Routledge, 2001); Diana Lary and Stephen MacKinnon, eds., *The Scars of War: The Impact of Warfare on Modern China*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01).

的戰事，與上一世紀相比較，不論在規模或傷亡方面，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譬如北洋時期各軍閥之間永無休止的混戰，以及國民黨與南方軍閥間爭奪勢力範圍與地方資源所進行的戰事。1928 年蔣介石所領導的國民革命軍，雖然宣稱完成了北伐，並「統一」中國，然而接連發生的戰事，依然成為 1930 年代中國社會的一個最主要特徵；自 1920 年代末期起，先後有蔣介石與桂系的戰事、中原大戰、蔣介石的剿匪戰役，以及 1937 年盧溝橋事變後全面展開的中日戰爭。

除了上述耳熟能詳的戰役之外，向來較不為人所知的是，自 1930 年代初起，中國的西南邊疆地區，亦曾發生一連串西藏與西康、青海部隊之間，以及康藏邊區內各股不同勢力間的軍事衝突；由於地理上的阻隔與該地區與外界之間通訊的缺乏，當時中國內地與國際輿論，對於這些中國西南邊區的戰爭，以及發生原因與實際情形，有如處在迷霧之中。<sup>3</sup>相較於當代中外學術界對於前述重大戰役所做的研究，這些自 1930 年代初期起青康藏高原地區發生的戰事，至今仍未受到中外學界重視，而在僅存少數曾提及這些邊界衝突的作品裡，這些事件除了被單純地歸類為近代中國的「邊政」議題之外，中國學者亦往往傾向視之為「英帝國主義所支持」的西藏與中國之間的對抗，以及近代英帝國主義對於中國西南地區具有領土野心的一個明顯例證。<sup>4</sup>如此的詮釋角度與看法，雖非完全錯誤或不妥，然而如同本文即將要分析的，這卻忽略了當時中國西南的西藏、西康、青海的地方軍閥與南京的中央政府之間

<sup>3</sup> 以 1931 至 1932 年的青藏與康藏戰爭為例，當時倫敦報章以「一場世人毫無所悉的戰事“War The World Knows Nothing About”」為標題，來形容這些發生在中國西南邊陲的戰事。見 *Daily Herald* (London), August 9, 1932, newsclip, enclosed in 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 British Library (London), India Office Record (以下簡稱 IOR), L/P&S/12/4170, India Office (London) to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New Delhi), August, undated, 1932. 在中國內地，一般輿論對於青康藏戰事究竟如何發生以及為何發生，同樣莫衷一是。見允恭，〈藏軍何又侵康？〉，《東方雜誌》，卷 31 號 7（民國 23 年 4 月），頁 4-5。

<sup>4</sup> 學界對於 1930 年代青康藏地區戰爭的研究，至今仍未有一深入與專門的分析與探討。帶有民族主義史觀描述民初以來漢藏邊界戰事的作品，可參見：楊公素，《中國反對外國侵略干涉西藏地方鬥爭史》（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2），頁 201-202；楊策、彭武麟主編，《中國近代民族關係史》（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9），頁 300-303。

微妙的政治關係，以及西南各省當局在當時所享有獨立於南京中央之外的強大自主性，同時亦忽視了 1930 年代初期以來，西藏、西南軍閥及南京國民政府三方面，對於「戰爭」有實際上的需求、期待、利用，並製造可能的戰事，以期能夠從中帶給各自勢力在軍事、政治與財政上的有利作用。

近幾年來，中、英文官方檔案與文史資料的陸續開放與出版，提供學術界一個機會，更清楚發掘與瞭解這些發生於 1930 年代、向來不為人所知的西南邊界戰爭，並且重新對這些戰事加以詮釋與評價。本文除了將這一系列邊陲地區戰事放在傳統中國邊疆政治分析脈絡下來理解之外，也嘗試突破既有的研究格局，把南京國民政府、西南各省軍閥與西藏政府作為三個不同主體來看待，<sup>5</sup>重新建構 1930 年代中國西南青、康、藏地區的政治、社會與軍事面貌。而藉由對這些西南邊陲戰事的分析，本文亦希望能夠對於「戰爭」在近代中國的邊政議題、漢藏關係，與 1930 年代中國西南地區各股勢力之間的權力競爭當中扮演何種角色，做進一步的探索與釐清。此一研究將指出，1930 年代西南邊區的戰事，事實上反映出「戰爭」在近代中國政治與社會中所扮演的一種特殊角色，以及「戰爭」對於近代中國領土上不同政治勢力所能夠帶來的積極功能；而康藏、青藏戰事與不同派系力量與軍閥間的武裝衝突，同時也代表著國民政府、西藏與西南軍閥之間，在中國西南地區資源競爭與政治、軍事版圖劃分的一種過程；此外，從更寬廣的中國與西藏近代史研究層面來看，本研究也呈現出一個與傳統上所認知的民國時期「漢藏對立」不同的論點：蔣介石所代表的南京國民政府中央與西藏政府之間，自 1928 年起乃至整個 1930 年代，事實上有許多充分的理由與共同利益，足以讓兩方在政

<sup>5</sup> 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是，雖然蔣介石的國民政府自 1928 年以來，就獲得國內外承認為當時代表全中國的中央政府，然而直到 1930 年代中期為止，其真正有效的統治範圍，嚴格說來，僅包含長江中、下游等華中地區，這使得吾人在研究近代中國中央與邊陲地區的關係時，必須更加注意到政治名份與政治現實之間的差距。見 James E. Sheridan, *China in Disintegration: The Republican Era in Chinese History, 1912-1949*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5); Julia C. Strauss, *Strong Institutions in Weak Polities: State Building in Republican China, 1927-194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治與軍事上建立起更進一步的合作互動關係，只不過因為許多種種複雜的因素，讓南京與拉薩的結盟可能性，終究無法實現。

## 一、南京與拉薩新互動關係下的漢藏邊界衝突

清末年間，駐藏辦事大臣趙爾豐與其所率領的川軍，在西藏與西南地區積極推動一系列的改土歸流運動，旨在加強清政府對西南中國的有效統治，然而這些改革卻造成十三世達賴喇嘛的極大反彈；在 1910 年川軍進入拉薩的前夕，達賴喇嘛逃往印度，並且獲得英屬印度政府的保護與接待。隨後不久，清帝國瓦解，十三世達賴在英屬印度政府的支持下回到拉薩，當時仍在藏的川軍被迫繳械並遭驅逐，前清駐藏官員也被要求撤離；另一方面，袁世凱的民國新政府雖曾努力彌補與西藏高層的關係，成果卻極為有限。<sup>6</sup>自此，中國中央在西藏已無實際影響力，漢藏關係事實上已呈現了中止狀態。1913-1914 年，在英國的強大外交壓力下，北京政府派員出席中、英、藏西姆拉(Simla)會議，並且默認西藏出席代表具有與中國代表平等的地位。在該會議上，英國提出劃分西藏為「內藏」與「外藏」的構想，金沙江以西地區稱為「外藏」，由達賴喇嘛的西藏政府自治，以東的西康、青海等地則稱為「內藏」，由「漢藏共管」。雖然出席會議的中國代表曾草簽此一劃分內、外藏的「西姆拉條約」，但是北京政府最終仍拒絕批准此一條約，會議最後宣告破裂。<sup>7</sup>

西姆拉會議破局所產生的最實際影響，就是中國西南省份與西藏之間，

<sup>6</sup> 北京政府當時曾立即宣布恢復被清政府革去名號的達賴喇嘛封號，並同意不在西藏實行新制，以向十三世達賴示好；然而達賴喇嘛的反應頗為冷淡，僅重申漢藏關係應建立在檀越(chos-yon，即師父與施主)關係的基礎上。見石青陽，〈藏事紀要初稿〉(民國 22 年 5 月)，第一章第四節，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以下簡稱《蔣檔》)，〈特交檔案／政治／西藏問題〉(以下簡稱〈西藏問題〉)，第 58 卷。

<sup>7</sup> 有關清末民初漢藏關係與西姆拉會議之討論，見馮明珠，〈近代中英西藏交涉與川藏邊情——從廓爾喀之役到華盛頓會議〉(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6)，頁 255-350；Warren W. Smith Jr., *Tibetan Nation: A History of Tibetan Nationalism and Sino-Tibetan Relations*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96), pp. 151-204.

未能有一個明確界定、相互認可且具有法理保障的邊界。此後，中國西南的四川部隊與西藏軍隊之間的邊境衝突與緊張狀態，即時有所聞。最嚴重的一次軍事衝突則發生在 1917 至 1918 年間，當時駐防昌都的川軍將領彭日昇，將幾名「越界」搜集糧草的藏兵捕獲並斬首，此舉引發拉薩當局的強烈憤怒，雙方遂爆發戰事。結果川軍嚴重潰敗，西藏軍隊不僅佔領了康區通往西藏內地的門戶重鎮昌都，並且將拉薩當局有效統治的區域，向東延伸十餘縣，包括原本為四川省所管轄的德格、鄧科、石渠等地，皆為藏軍所有，最後並與川軍隔著雅礱江對峙。<sup>8</sup>

另一方面，在英屬印度政府的建議與協助下，十三世達賴喇嘛自 1920 年代起，即熱衷於一系列的內部改革計畫。這些「新政」包括：建立一所英式學校、開辦軍官訓練學校、試採金礦、設立水力發電廠，以及建立郵電局與電報局等機構；其中最重要的是，拉薩當局希望能夠建立一支具有足夠力量防衛漢藏邊界、並抵抗川軍來犯的部隊。<sup>9</sup>為了推動這些計畫，十三世達賴喇嘛的政府無可避免地面臨了沉重的財政負擔，這促使拉薩必須以開闢新的稅收來源，以籌措充足的資金。1922 至 1923 年之際，拉薩更破天荒地向九世班禪喇嘛管轄的寺院徵收軍糧，並要求班禪所駐錫的札什倫布寺負擔四分之一的西藏軍備總支出，這一舉措迫使班禪喇嘛於 1923 年底出走中國內地，在政治上公然與十三世達賴喇嘛決裂。<sup>10</sup>到了 1928 至 1929 年左右，西藏的財政與經濟狀況進一步惡化；當時國際羊毛市場的價格受到 1920 年代全球經濟大恐慌(Great Depression)的影響而嚴重下跌，而這對於以羊毛為最主要出口產品

<sup>8</sup> 馮明珠，〈近代中英西藏交涉與川藏邊情〉，頁 359-376；喜饒尼瑪，〈試論 1917 年至 1918 年川藏糾紛的性質〉，收入氏著，《近代藏事研究》（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2000），頁 149-162。

<sup>9</sup> IOR, L/P&S/12/4163, Lt. J. L. R. Weir (British Political Officer in Sikkim) to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August 25, 1930; L/P&S/20/D222, Hugh E. Richardson, *Tibetan Précis* (Calcutta, 1945), pp. 25-27.

<sup>10</sup> 方勝，〈從靈童到領袖——歷代班禪秘史〉（北京：海南出版社，1996），頁 109-122；Melvyn C.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p. 89-138.

的西藏經濟，無疑是雪上加霜，也使得拉薩政府必須極力另外開拓西藏的對外貿易市場，來挽救其經貿狀況。十三世達賴雖也曾向英屬印度政府尋求援助，不過當時新德里僅允諾將考慮同意西藏政府對由印度與尼泊爾輸往西藏的貨品抽稅，以及同意以優惠價格售予西藏政府當時所急需的白銀，以解決其在財政上所面臨的困難。<sup>11</sup>

西藏政府於 1920 年代晚期在財政與經濟上的困境，一方面迫使拉薩不得不放棄部份的改革計畫，另一方面也促使達賴喇嘛決定主動與蔣介石新成立的國民政府接觸；1929 年 9 月，當時擔任北京雍和宮住持的貢覺仲尼，在達賴喇嘛的指示下，主動與國民政府高層聯繫，他並先後在北京與南京會見了蒙藏委員會委員長閻錫山與蔣介石。根據當時的檔案資料所揭示，拉薩高層願意主動向南京伸出友誼之手，具有多重考量；當時國民政府甫完成北伐並初步統一中國，蔣介石儼然已成為中國政壇上的新強人，達賴喇嘛因此希望藉由向南京方面釋出善意，換取蔣介石政府運用其對西南中國軍閥的影響力，化解川藏邊界長期以來的緊張狀態，並且重新勘定漢藏邊界，以減輕西藏的軍事壓力。<sup>12</sup>貢覺仲尼與國府官員的會談紀錄也顯示，西藏政府亟盼藉由漢藏政治關係的改善，促成西藏的羊毛、皮貨、藥材等貨品銷售至中國內地廣大的市場，而西藏與川康邊界若能保持和平，勢必有助於降低自西南中國

<sup>11</sup> IOR, L/P&S/12/4163, Weir to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August 3 and 24, 1930; News report dated August 20, 1930. 而當時西藏境內因經濟蕭條，銅造偽幣充斥市場，迫使拉薩當局必須強力收回舊銅幣，並以新的銀幣取代之。見 N. G. Rhodes, "The Development of Currency in Tibet," in Michael Aris and Aung San Suu Kyi, eds., *Tibetan Studies: In Honour of Hugh Richardson* (Wiltshire, England: Aris & Philips Ltd., 1980), p. 267. 有關 1920 年代晚期西藏財政的紊亂情況，另見：頌華，〈藏人反對英人的經濟侵略〉，《東方雜誌》，卷 26 號 10（民國 18 年 5 月），頁 8-10。

<sup>12</sup> 西藏當除了要防衛川藏邊界之外，也因為一件司法管轄權的爭議，而與尼泊爾交惡。當時有一位具有藏、尼血統的尼泊爾公民，在拉薩以走私罪名被西藏政府起訴，當這名尼泊爾人向該國駐拉薩代表團尋求政治庇護時，西藏警察竟然衝入該代表團，將嫌犯逮捕。尼泊爾首先向拉薩方面抗議其違反 1855 年尼藏協定裡有關領事裁判權的規定，但卻未獲任何具體回應；而當這名嫌犯被拉薩當局處死的消息稍後傳開，藏、尼雙方關係急速惡化，尼泊爾總理首先下令調動駐在邊境的部隊，西藏政府亦部署軍隊以為回應。藏尼邊境甚至一度傳出將爆發軍事衝突。見 Hugh E. Richardson, *Tibetan Précis*, pp. 38-40.

銷入西藏的邊茶之成本與價格。拉薩方面評估，這些計畫一旦實行，必將大大有利於西藏政府改善窘困的財政狀況。<sup>13</sup>

十三世達賴所傳達的善意立即為南京方面所接受；在 1930 年初，貢覺仲尼本人與國民政府文官處一名具有漢藏血統的女書記官劉曼卿，先後代表蔣介石的新政府，率領使團前往拉薩訪問，並且獲得十三世達賴喇嘛的隆重歡迎與熱情接待；這位西藏主政者並且向來訪的特使們強調，他了解「主權不可失」的道理，指出英國政府雖對他百般誘惑，但是西藏向來只與對方「虛與周旋」，並且「未嘗與以分釐權利」，藉以宣示西藏對中央的一片忠心。<sup>14</sup>隨後西藏政府也宣布不久將會在南京與北平等地設立辦事處，與國民政府建立起進一步的政治連繫。一時之間，中國內地輿論對於初肇建的國民政府在西藏邊疆議題上所獲得的初步成果，給予相當的好評。而國際間，特別是在西藏有深厚利益的英國與英屬印度政府，對於中國漢人勢力在此如此快的時間裡就要回到西藏，更是感到不可思議。<sup>15</sup>

然而就在中國中央政府與西藏之間，表面上建立起自民國初年以來最為密切關係的同時，康、藏邊界卻在 1930 年底爆發了自 1917 至 1918 年以來最為激烈的軍事衝突。此一戰事係 1930 年的春夏之際，位於西康甘孜地區的大金與白利兩喇嘛寺廟之間，爭奪寺產所導致。當時的白利寺住持雅拉活佛，本出自大金寺，在掌管白利寺之後，與當地土司及村民不合，1930 年雅拉活

<sup>13</sup> 〈蒙藏委員會副委員長趙戴文致閻錫山〉（民國 18 年 9 月 14 日），國史館藏，《閻伯川先生要電存錄》，〈北伐附三全會議及蒙藏事務案〉，檔號 202000013A，微捲 90/2367-90/2368；劉曼卿，《國民政府女密使赴藏記實》（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頁 112-113；IOR, L/P&S/10/1088, News reports from Weir to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dated February 19 and 21, 1930.

<sup>14</sup> 劉曼卿，《國民政府女密使赴藏記實》，頁 113。

<sup>15</sup> 〈蒙藏會工作與蒙藏近況〉，《中央週報》，期 122（民國 19 年 10 月），頁 12-13；“Miss Liu’s Mission to Tibet,”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Shanghai), September 6, 1930. 英屬印度政府對於兩個南京使團前往拉薩訪問，以及中國勢力可能重回西藏的擔憂，另見 IOR, L/P&S/10/1088, Memorandum entitled “Review of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enclosed in Weir to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dated May 25, 1930; Telegram from Viceroy, Foreign and Political Departmen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ia, May 7, 1930.

佛決定把白利寺的寺產轉遷由大金寺管理，此舉造成白利土司與村民的強烈反對，大金寺的武裝喇嘛因而起兵攻佔白利村，而駐守在白利村的四川軍閥劉文輝的部隊亦立即介入，並且與大金寺武裝喇嘛發生衝突。雅拉活佛隨後向西藏政府求援，在達賴喇嘛的指示下，藏軍強渡雅礱江，不但將劉文輝的部隊驅離白利村，更佔領了當時仍由漢人所統治的甘孜地區。<sup>16</sup>四川省政府與西藏政府雙方則互相指控，應對此一軍事衝突負責，而在極端不信任川康地區軍閥的情況下，十三世達賴喇嘛要求南京派員前來調查與調解。此一要求獲得國民政府的同意，然而當準備前往調處的南京蒙藏委員會委員唐柯三尚未抵達甘孜之前，藏軍卻又繼續向東挺進，並且佔領了包括甘孜與瞻對在內的幾個康區重要據點，藏軍甚至一度逼進到只距離康定數日行程的地方。<sup>17</sup>

在這場寺產之爭當中，很顯然地白利寺擁有四川劉文輝部隊的支持，而大金寺則與拉薩方面有極為密切的關係，然而為何一場原本應只是小規模的區域性衝突，會在短時間內擴大為嚴重的漢藏邊界戰爭？對十三世達賴喇嘛與西藏政府來說，若一旦失去了對大金寺的掌握，將等於是失去了其在康區的一個重要的藏傳佛教據點，以及此一寺院所能夠帶來的可觀稅收與政教影響力。<sup>18</sup>除此之外，在康藏邊界無法有效勘定的情況下，拉薩當局當時亦有可

<sup>16</sup> 〈白利寺僧等請予制止大金寺強佔田地房屋以勢欺壓等情致蒙藏委員會呈〉（民國 19 年 6 月），收入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編，《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料匯編》（以下簡稱《史料匯編》）（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冊 6，頁 2541-2542；孔慶宗，〈西藏插手西康大金白利糾紛的真相〉，《文史資料選輯》（合訂本），第 32 卷第 93 輯（1986），頁 98-115；IOR, L/P&S/10/1228, Stark Toller (British Consul-General at Chungking) to the British Legation in Peking, July 17, 1930.

<sup>17</sup> 石青陽，〈藏事紀要初稿〉，第五章第一節，《蔣檔》，〈西藏問題〉，第 58 卷；〈文官處奉轉劉文輝請示如何應付大金寺因藏方增援不遜和平解決命令事電致蒙藏委員會函〉（民國 20 年 1 月 5 日），《史料匯編》，冊 6，頁 2545-2547；IOR, L/P&S/10/1228, Weir to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September 21, 1930; L/P&S/12/4181, Memorandum by India Office entitled "Recent Events in Tibet," enclosed in India Office to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June 27, 1935; L/P&S/12/2279, Foreign Office Annual Report, 1932: China, pp. 11-12.

<sup>18</sup> 有關民國時期康區喇嘛教寺廟龐大複雜的軍、政、教與財經商業網絡，參見：甘孜藏族自治州概況編寫組編，《甘孜藏族自治州概況》（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頁 86-89；甘孜州志編纂委員會編，《甘孜州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頁 1245-1248。有關藏傳佛教寺廟系統，其在財政、經濟上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各喇嘛寺院與拉薩政府的關係，另詳

能想藉由一場軍事上的勝利，轉移西藏內部對於日漸惡化的財政狀況所造成的不滿，並且確保能夠把尚未明確界定的漢藏邊界，從雅魯藏布江往東進一步推向金沙江。<sup>19</sup>

而對於四川省主席劉文輝來說，自 1920 年代初期起，其在西南中國所享有的政、軍優勢地位，到了 1930 年底時，已經面臨嚴重威脅；劉在當時所遭遇的主要敵手，是他的侄子劉湘與另一軍閥田頌堯。1931 年初，有關四川大小軍閥準備聯合起來對付劉文輝的謠傳，就一直沸沸揚揚，因此劉極有可能企圖以誇大康藏邊疆警訊，甚至製造西藏在英帝國主義支持下入侵中國西南的印象等手段，做為自己在川康政壇繼續立足的籌碼。換言之，劉文輝利用此一「邊疆危機」，不但可以利用「鞏固邊防」與「漢藏友好」等當時極為流行的政治語言，向南京「中央」要索更多的經濟與軍事上的資源，亦可將自己塑造為反抗帝國主義侵略，以及捍衛中國邊疆領土的英雄，迫使其在四川的敵手，不得不考量聯手對劉文輝發動攻擊在國內輿論方面所可能造成的不利後果。<sup>20</sup>

## 二、「戰爭」與國民政府在西南邊陲的權力建構

然而面對 1930 年爆發的漢藏邊界戰爭，南京方面卻有不同的想法。從現實的角度觀之，不論劉文輝或是西藏政府哪一方最後在戰事佔了上風，當時在中國內地尚未完全站穩腳步的國民政府，都不可能成為實質的受益者；對

見 Robert J. Miller, *Monasteries and Culture Changes in Inner Mongolia*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59).

<sup>19</sup> 當時英國駐重慶總領事館的外交人員對於拉薩發動戰事的動機，即持此一看法。見 IOR, L/P&S/10/1228, Toller to British Legation in Peking, February 11, 1931.

<sup>20</sup> 有關南京國民政府對於當時西南地區此一微妙政局的看法，以及對於劉文輝利用康藏危機替自己製造「英雄形象」的懷疑，見《中央週報》，期 219（民國 21 年 8 月），頁 35-36；期 226（民國 21 年 10 月 3 日），頁 21-22。有關 1930 年代初期的四川政局，詳見 Robert A. Kapp, *Szechwan and Chinese Republic: Provincial Militarism and Central Power, 1911-1938*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87-98.

蔣介石而言，到 1931 年為止，他從未能真正有效地統治中國西南的青康藏地區，他的「中央政府」也還未能夠實際控制四川、康區或西藏等地區的任何經貿活動與稅收；當時在名義上已被編為「國民革命軍」一部份的四川劉文輝部隊，南京對其掌握更只是有名無實。因此就國民政府而言，一場邊界戰事反而提供了一個契機，讓南京有機會在中國西南初立據點，並且將原本不存在的中央影響力，逐漸滲透至這一個地區，此一思維充分反應在康藏戰事的後續發展上。

1931 年 11 月，在經過冗長的談判與溝通之後，從南京遠道而來的蒙藏委員會委員唐柯三終於與藏軍代表達成一臨時協議，南京準備依照現狀，允許拉薩佔有包括甘孜與瞻對在內的金沙江以東地區。<sup>21</sup>把康藏實際邊界從雅礱江推至金沙江東岸，對於當時在中國西南尚無實質利益糾葛的國民政府而言，並未有太大的影響或損失，然而此舉卻對劉文輝在康區的政、經與軍事利益，構成嚴重威脅，劉因此積極運作其所控制的康定「康藏通訊社」，向中國內地散布康藏戰事極度惡化的新聞，宣稱英帝國主義已提供強大的武器裝備支援藏軍，準備進一步侵略中國西南領土。劉文輝同時亦煽動西康旅京商會、同學會與同鄉會等團體，嚴厲批評從南京來的「賣國賊」已與西藏簽訂了喪權辱國的條約，同時把康藏邊區的危局與東北甫發生的「九一八事變」相比，向南京施壓。面對來自川康方面的壓力，國民政府只得擱置此一臨時協定，並決定暫時不再公開介入康藏紛爭。<sup>22</sup>

<sup>21</sup> 〈唐柯三報聞與瓊讓議訂解決大白事件八項條件致蒙藏委員會電〉（民國 20 年 11 月 7 日）；〈行政院為核准與西藏代表所訂康案條件八項即照辦理致蒙藏委員會指令〉（民國 20 年 12 月 10 日），《史料匯編》，冊 6，頁 2568-2569；IOR, L/P&S/10/1228, Toller to the British Legation in Peking, January 25, 1932; L/P&S/12/4169, British Political Officer in Sikkim to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October 6, 1932; Tsepon W. D. Shakabpa, *Tibet: A Political Hist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206-273.

<sup>22</sup> 《中央週報》，期 185（民國 20 年 12 月），頁 12-13；〈馬福祥為所訂康案八條各方反對甚烈暫緩簽字事致唐柯三電〉（民國 20 年 12 月 23 日），《史料匯編》，冊 6，頁 2570。不過當時英國駐重慶總領館所得到的情報，卻是指稱四川省主席劉文輝曾願意勉強接受唐柯三與藏方所達成的邊界協定。見 IOR, L/P&S/10/1228, Toller to the British Legation in Peking, January 25, 1932.

然而當南京國民政府高層決定避免介入康藏戰事之際，其在另一方面卻已準備利用康藏邊區不穩定的局面，挖劉文輝在西南中國的牆腳，以建立起自己的勢力。幾乎就在唐柯三與西藏代表談判停戰協議的同時，國府派遣蒙藏委員會另一委員、出身西康的格桑澤仁，以「國民黨西康黨務特派員」的身份，前往康藏邊區積極活動。1932年2月，格桑澤仁宣稱已獲得南京「中央政府」的委任與授權同意，在巴安成立「西康省防軍司令部」，並自任司令，此一機構在政治上打著「康人治康」的旗子，積極招募當地康民組成武裝衛隊。一時之間，格桑澤仁在康區的聲勢高漲，他不但用國民政府中央的名義，任命了巴安、得榮等縣的新縣長，並頒布新的徵兵法案，其武裝衛隊且成功地提繳了劉文輝駐巴安地區部隊的武器。根據劉文輝的指控，格桑澤仁甚至曾暗地裡與進犯的西藏軍隊合作，攻擊劉的部隊。<sup>23</sup>

不過國民政府利用西康政治菁英做為「代理人」，在西南中國地區進行行政權建構的首次嘗試，數月之後在劉文輝以優勢武力鎮壓格桑澤仁的武裝部隊之後，以失敗告終。格桑澤仁逃回中國內地，並且在南京的庇護下，繼續擔任蒙藏委員會委員。<sup>24</sup>而另一方面，類似大金與白利兩寺、各擁政治靠山所導致的寺廟武裝衝突事件，則於1932年春天起，同樣於青海南部的玉樹地區上演。向來由拉薩所支持的尕且寺，與當地由統治青海的馬氏家族所支持的德賽寺，長久以來就因徭役與賦稅分配不公等議題而時有摩擦，兩個喇嘛寺院的衝突最後在1932年4月間，演變成爲一場青海與西藏部隊之間的戰事。一時之間，藏軍勢如破竹，跨越唐古刺山進入青海南部的大、小蘇爾莽，最後幾乎佔領整個玉樹地區；而原本已駐紮在甘孜地區的藏軍部隊，也在同時對康定方向進行新一輪的進攻。很顯然的，拉薩當局此刻已下定決心以軍事

<sup>23</sup> 四川省康定縣志編纂委員會編纂，《康定縣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頁333-336。《中央週報》，期203（民國21年4月），頁11-13。《中央日報》（南京），民國21年3月20日，頁3；4月3日，頁3；4月15日，頁2。喜饒尼瑪，〈格桑澤仁其人其事〉，《近代藏事研究》，頁361-365。IOR, L/P&S/10/1228, Toller to the British Legation in Peking, April 13, 1932.

<sup>24</sup> 《中央週報》，期227（民國21年10月），頁20-22。《中央日報》，民國21年6月1日，頁3；6月27日，頁3；7月4日，頁6。

手段擴大其統治版圖，並企圖控制青、康地區的重要貿易集散中心，以掌握該地區的經貿活動，與隨之而來的可觀稅收。<sup>25</sup>

1932 年春天起，西藏與西康、青海之間的新一輪戰事，以及號稱隸屬於國民政府中央統轄的青、康部隊在戰役初期居下風的戰果，使得當時中國內地的輿論皆毫無例外地，把這些西南邊疆危局，視為是西藏政府受到英帝國主義指使下的結果。<sup>26</sup>然而英國印度事務部檔案的機密電報與文件卻顯示，縱使西藏政府當時曾不斷努力向英方解釋，拉薩以武力向青海與西康邊境挺進，是認清蔣介石的南京國民政府實際上尚未有能力駕馭中國西南軍閥的事實之後，所採取的「自衛行動(self-defense)」。英屬印度政府當時對於十三世達賴喇嘛利用軍事方式擴張版圖的政策，實際上是抱持著相當反對的立場，並曾斥責達賴喇嘛發動戰爭，並欲將英印政府一同捲入的企圖，是極為「不智(unwise)」之舉。<sup>27</sup>而南京國民政府則是利用青藏戰爭的爆發，再一次企圖將中央的影響力帶入青海地區；1932 至 1933 年之際，蔣介石的嫡系部隊已初步掌握了甘肅南部地區，當時南京方面曾計劃透過當時駐守在隴南的胡宗南部隊，欲逐步控制中國西北其他地區。青藏戰事發生後，胡宗南的一名軍事參謀曾奉命前往青海，以「鞏固青藏邊防」為由，向當時鎮守青海南部的馬步芳提出軍事部署等議題。馬步芳警覺到國民政府準備以青藏戰爭為藉口，並以調動蔣介石嫡系部隊進駐增援等手段，削弱其在青海的地位，因而

<sup>25</sup> 蔡作禎，〈青藏戰役中我的經歷〉，《青海文史資料選輯》，第 2 輯(1964)，頁 41-50；《青海三馬史料》編輯組，〈青藏戰事的內幕〉，《青海文史資料選輯》，第 14 輯(1985)，頁 128-129；Hugh E. Richardson, *Tibetan Précis*, pp. 104-105.

<sup>26</sup> 對於 1932 年 4 月起新一輪的漢藏邊界戰事，當時中國國內與國際上亦不乏有英日兩國秘密協議，以互相承認對方在西藏與滿洲擁有特殊利益之說。相關評論參見：IOR, L/P&S/12/4173, “A Great Tibet,” Illustration of the Lytton Report, enclosed in the British Embassy in Moscow to Foreign Office, October 20, 1932; “What’s Back of Renewed Tibetan Advance into Chinghai?” *China Weekly Review*, April 15, 1933, enclosed in Sir Miles Lampson (British Minister to China) to Foreign Office, May 2, 1933.

<sup>27</sup> 有關英屬印度政府對於十三世達賴喇嘛的這一批評，見 IOR, L/P&S/4170, Confidential dispatches from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to India Office, September 13 and November 3, 1932; Government of India to India Office, September 13, 1932; Report from the British Political Officer in Sikkim to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March 1, 1933.

授意其所掌握的「青海電訊社」，故意誇大藏兵進犯告急的警訊，同時並向南京索求更多的財政、軍事支援。此一策略最後迫使蔣介石不得不暫時打消插手青海軍事的念頭。<sup>28</sup>

為了保障各自在中國西南地區的政治、軍事與經貿利益，劉文輝與馬步芳決定在軍事上採取聯合行動，以驅逐進犯的藏軍。<sup>29</sup>從 1932 年夏天起，西藏部隊逐漸失去原先的優勢；在西康地區，到了當年 7 月底，藏軍被迫撤出其所佔領的甘孜，並且退守金沙江以西；在玉樹地區，從西寧前來增援的青海部隊，不但成功地將藏軍逐出該地，並且往南乘勝追擊，與西康部隊形成一北一東夾擊藏軍之勢。1932 年 9 月，青海部隊已收復自 1918 年以來就被西藏所統轄的德格、石渠、鄧科等重要縣份，劉文輝與馬步芳一度考慮繼續聯手攻佔康區重要門戶昌都。<sup>30</sup>另一方面，藏軍在戰事上的逆轉，迫使十三世達賴喇嘛不得不緊急向英屬印度政府求助，英方考量到避免戰事繼續延長，並不願意給與拉薩實質的軍事援助，而是轉向南京國民政府施以外交壓力，希望中國西南軍閥中止對藏軍的攻勢，蔣介石因此下令青康軍隊暫停攻取昌都的行動。<sup>31</sup>有趣的是，雖然劉文輝與馬步芳的部隊已扭轉劣勢，並逐漸將藏軍驅逐出金沙江以西，在這段期間內，西南地區各軍閥卻仍不斷地向南京中央發出一系列「告急」函電，強調邊事戰況膠著危急，希望蔣介石能夠撥給

<sup>28</sup> 《青海三馬史料》編輯組，〈青藏戰事的內幕〉，《青海文史資料選輯》，第 14 輯(1985)，頁 129-130；〈馬步芳呈蔣委員長函〉（民國 21 年 6 月 9 日），編號 21000623，《蔣檔》，〈特交文電／領袖事功／領導國家建設／積極治邊〉（以下簡稱〈積極治邊〉），第 2 冊。

<sup>29</sup> 在青藏、康藏戰爭之前，劉文輝與馬步芳各自統轄著其在川康與青海南部的勢力範圍，彼此之間甚少有互動關係，而為了鞏固彼此的利益不受南京或拉薩方面的影響，兩方於 1932 年之際，首度在軍事上進行合作，劉與馬的合作互動關係，還表現在日後的青康藏會議上，見下文討論。

<sup>30</sup> 《青海三馬史料》編輯組，〈青藏戰事的內幕〉，《青海文史資料選輯》，第 14 輯(1985)，頁 131-134。〈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石青陽呈蔣委員長〉（民國 21 年 7 月 21 日），編號 21029827；〈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石青陽呈蔣委員長〉（民國 21 年 8 月 27 日），編號 21013697，《蔣檔》，〈積極治邊〉，第 2 冊。IOR, L/P&S/12/4170, Confidential dispatch from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to India Office, August 9, 1932; Memorandum by Mr. Ingram (British Charge d'Affairs) to Foreign Office, dated September 2, 1932.

<sup>31</sup> 〈蔣委員長致四川省主席劉文輝函〉（民國 21 年 9 月），編號 21031275；〈蔣委員長致青海馬代主席麟電〉（民國 21 年 10 月 13 日），編號 21031976，《蔣檔》，〈積極治邊〉，第 2 冊。

更多的武器裝備與財政援助，以鞏固中國西南邊防。<sup>32</sup>

面對西藏與康、青之間在中國西南地區戰事上的新變化，南京國民政府決定召開「西防會議」，召集青海、四川、陝西、甘肅與雲南五省的軍事代表，共商西南邊陲的國防大計。鑑於當時南京對於這些邊陲省份並無實際控制力，回顧歷史，「西防會議」的舉行，因而成了南京國民政府 1927 年主政以來，以「鞏固邊防」與「解決漢藏衝突」等理由，首次公開介入各邊陲省份軍政事務。<sup>33</sup>然而對於各省的半獨立軍閥勢力而言，漢藏邊界戰事所帶來的形勢，卻也被利用來替自己的地方政權爭取更多有利的資源。譬如，西防會議甫結束，青海省府即宣布新增設「財政整理委員會」，藉以向省境內的商行與百姓籌措更多的稅收來源，以應付青藏邊界的「危局」。青海省代理主席馬麟更要求國民政府宣布將甘肅南部的拉卜楞寺正式歸併青海管轄，其目的本在於掌控該地區龐大充沛的稅收與政教資源；然而當時馬麟向南京所提出的理由，卻是指控拉卜楞寺與拉薩有不尋常的密切關係，這勢必將嚴重危及青藏邊界，並使青海腹背受敵。<sup>34</sup>很顯然地，南京中央與西南各省軍閥，皆巧妙地運用「鞏固西南邊防」、「促進五族共和」與「解決漢藏危局」等政治語言，為自己的立場尋求更多的正當性，以及替各自的勢力獲取最大的軍事與政治利益。

<sup>32</sup> 有關劉文輝與青海馬氏家族的此類告急電文，以及南京對於西南軍閥利用青康藏戰事向中央要索更多資源的疑慮，參見〈行政院抄發劉文輝陳報數月與藏軍交戰並攻下大金寺等經過情形電治蒙藏委員會訓令〉（民國 21 年 8 月 18 日），《史料匯編》，冊 6，頁 2577-2579；〈楊虎城轉呈蔣委員長有關青海省主席馬麟函報〉（民國 21 年 8 月 26 日），編號 21013642，《蔣檔》，〈積極治邊〉，第 2 冊；《中央週報》，期 226（民國 21 年 10 月），頁 21-22；〈邊防問題〉，《中央週報》，期 276（民國 22 年 7 月），頁 1。

<sup>33</sup> 此一會議在參謀次長賀耀組的召集下，於 1932 年 9 月間在南京召開。有關西防會議，見〈參謀本部次長賀耀組呈蔣委員長〉（民國 21 年 9 月 20 日），編號 21031479，《蔣檔》，〈積極治邊〉，第 2 冊。《中央日報》，民國 21 年 9 月 22 日，頁 3；9 月 23 日，頁 3；9 月 27 日，頁 3；9 月 29 日，頁 3。

<sup>34</sup> 陳秉淵，〈馬麒在青海封建割據局面的形成及其建制〉，《青海文史資料選輯》，第 9 輯(1982)，頁 27-34。

### 三、西康建省、長征與中國西南的權力互動

1932年10月，劉文輝與西藏軍事代表在金沙江東岸的崗托，簽訂停戰協定，雙方約定以金沙江為界，互不侵犯。此一停戰協議的達成，與其說是國民政府停戰令的影響力所致，不如說是因為四川新起的內戰，迫使劉文輝不得不儘快結束與藏軍的作戰，以免腹背受敵。而青海與西藏之間的停戰協定，則是拖到1933年6月才簽署，雙方代表在青藏玉樹邊界劃定了一個非戰區，以避免日後衝突的發生。不過經過了此一戰事，統治青海的回教馬氏家族勢力，已更進一步向南延伸至青軍新收復的康北石渠、鄧柯與德格一帶。<sup>35</sup>這兩個停戰協定在簽署前，內容並未先呈報國民政府中央核准，而且曾擅用「條約」字樣，一度引起南京方面極度不快；但當時南京對西南地區青、康、藏三方的約束力極為有限，國民政府高層最後只有被動地默認這些文件的有效性。<sup>36</sup>

1933年四川各軍閥之間內戰的結果，是劉湘的部隊徹底擊潰劉文輝，成為西南中國的新盟主，蔣介石立即任命劉湘為新的四川省主席，而劉文輝的勢力則被逐出四川，其殘兵餘部則退守至康區。<sup>37</sup>從長遠歷史角度觀之，劉文輝在四川內戰的失利，卻加速促成西康建省的腳步。早在1928年底，南京國民政府曾正式宣布將北洋政府時期的西康特別行政區改建為省，然而此一構想並未為劉文輝所重視，當時劉仍統有四川富饒地區七十餘縣，對於貧瘠落

<sup>35</sup> 〈川康邊防總指揮部駐京辦事處抄報崗托和約及簽訂經過致蒙藏委員會呈〉（民國23年3月20日），《史料匯編》，冊6，頁2587-2589；《青海三馬史料》編輯組，〈青藏戰事的內幕〉，《青海文史資料選輯》，第14輯(1985)，頁134-135；IOR, L/P&S/12/4169, Memorandum by Toller, British Consul-General at Chungking, dated February 28, 1933.

<sup>36</sup> 〈蒙藏委員會為沿邊地方長官互訂條款只能用規約不得用條約字樣致行政院呈〉（民國23年8月22日）；〈行政院為核准沿邊地方長官互訂條款只准用規約不得擅用條約字樣致蒙藏委員會指令〉（民國23年9月1日），《史料匯編》，冊6，頁2592-2593。

<sup>37</sup> 黃應乾，〈劉湘、劉文輝混戰始末〉，《文史資料選輯》（合訂本），第11卷第33輯(1986)，頁59-64；陳光藻，〈四川軍閥最後的一場混戰〉，同上書，頁85-94；Robert A. Kapp, *Szechwan and Chinese Republic*, pp. 99-121.

後的西康地區根本無心建置，南京方面迫於對劉控制力的薄弱，不得不將建省計畫暫時擱置。而 1933 年四川內戰之後，中國西南地區的政治生態不變，戰敗後的劉文輝，急欲在西南地區重新站穩腳步，並鞏固所剩無幾的地盤，因而一改先前消極反對西康建省的態度，積極敦促國民政府實現西康建省的承諾，以鞏固西南邊防。對蔣介石與南京而言，亦不願意看到劉湘的勢力因為劉文輝垮台，而在西南中國坐大，故亦願積極公開支持劉文輝據有西康地區，以牽制劉湘在四川的力量。在這些考量盤算之下，由劉文輝主持的「西康建省委員會」於 1934 年初正式成立。<sup>38</sup>

根據國民政府的官方說法，這個即將成立的新省份版圖，乃沿襲清末趙爾豐所提議的方案，其正式統轄區域，東起大渡河，向西遠達當時仍為拉薩有效控制的江達（太昭）地區。易言之，整個西康省境事實上只有金沙江以東大約五分之二的土地，是在劉文輝「西康建省委員會」的實際控制之下。當時即有部份國民政府官員，對於南京將西康省界深入涵蓋西藏實際統治的版圖，視為高度政治敏感，因而提出異議，認為此一舉措勢必造成拉薩方面的反感與不滿，並且也將使得仍處於微妙脆弱的漢藏關係，蒙上新的陰影。<sup>39</sup>儘管如此，對於當時高喊提倡「五族共和」與「漢藏友好」的南京高層而言，讓在四川內戰中嚴重受挫的劉文輝，在中國西南康區仍保有一隅喘息之地，並且在西康省版圖劃分上暗示他未來將有機會統治金沙江以西的廣大土地，以作為對付、制衡並削弱拉薩或其他西南軍閥勢力這一權力平衡的一著棋。其重要性，從政治現實的角度觀之，是要遠大於討好當時國民政府力量所不

<sup>38</sup> 劉君，〈簡論西康建省〉，收入《民國檔案與民國史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檔案出版社，1988），頁 321-331；王成組，〈西康建省〉，《東方雜誌》，卷 31 號 23（民國 23 年 12 月），頁 57-60。

<sup>39</sup> 持這類看法的，包括當時實際負責國民政府駐藏辦事處業務的蔣致余，以及 1934 年隨黃慕松使團前往拉薩弔唁十三世達賴喇嘛的外交部參議林東海等。見〈蔣致余呈蔣委員長函〉（民國 24 年 4 月 11 日），編號 42355，《蔣檔》，〈西藏問題〉，第 60 卷；林東海，〈林東海隨黃慕松專使入藏呈蔣委員長報告書〉（民國 24 年），編號 42520，《蔣檔》，〈西藏問題〉，第 61 卷。拉薩向英屬印度政府表示對於西康宣布建省的疑慮與不滿，見 IOR, L/P&S/12/2279, Foreign Office Annual Report: China, 1936, p. 14.

能及的西藏政府。

蔣介石自 1934 年起一連串的剿共戰役，與圍剿紅軍「長征」的軍事行動，給了國民政府另一個把中央政令與影響力帶進中國西南地區的契機。從 1935 年春到 1936 年 5 月間，在國民黨部隊的追剿下，中共紅軍第一、第二與第四方面軍先後從江西向西，經過貴州、川康、青海與甘肅等地，向陝北逃竄。其中第二與第四方面軍在賀龍、張國燾的率領下，曾深入康藏邊區，而在與當地藏族部落與康區土司、頭人的交涉與互動過程中，紅軍極力宣傳中共寬容的少數民族政策，以尋求西南邊區少數民族部落團體的支持。此外，紅軍不但協助藏族建立自身的政權與武裝，並且利用長征的機會，在西南邊疆地區實施社會主義，並嘗試建立蘇維埃體制。在 1935 年底至 1936 年 5 月間，駐守在康藏邊區的紅軍曾先後在道孚、爐霍、甘孜等地，成立數個蘇維埃博巴（藏族）政權。在這些地區性革命政權的基礎上，一個初具規模的「中華蘇維埃博巴政府」，最後並於 1936 年 5 月在甘孜宣告建立。<sup>40</sup>

中共紅軍在西南邊界與藏族交好並且成立蘇維埃政權，以及西康劉文輝部隊保存實力不願真正投入剿共等局面，促使蔣介石不得不採取有效的反擊措施。1935 年中，國民政府任命出身康區的西藏紅教領袖七世諾那呼圖克圖擔任「西康宣慰使」，前往西康地區，代表中央向康藏地區的少數民族團體宣達國民政府的善意。<sup>41</sup>在南京的軍事、政治與財政等各方面的支援下，諾那率領新成立的「西康宣慰使公署」，浩浩蕩蕩地前往康定、道孚、巴安、德格、爐霍、甘孜等地活動，在各種不同的公開場合裡，除了主持宗教法會儀式與活動之外，諾那呼圖克圖儼然成為蔣介石與國民政府中央在康藏地區的代言人。他不但積極地與當地土司、頭人與寺院的宗教領袖來往，宣揚南京中央的德政，並且極力貶抑紅軍與共產黨思想，以阻止當地少數民族團體與

<sup>40</sup> 張中復，〈中共早期民族政策之研究(1921-1949)〉，《西藏研究會訊》，期 12（1991 年 9 月），頁 3-10；喜饒尼瑪，〈略論紅軍北上抗日過藏區〉，《近代藏事研究》，頁 195-200。

<sup>41</sup> 江安西、來作中、鄧俊康，〈諾那事變記略〉，《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 29 輯(1983)，頁 64-77；周錫銀，〈諾那的部分重要史料輯錄〉，同上書，頁 88-94。

紅軍合作的可能性。<sup>42</sup>而在非公開場合，諾那呼圖克圖與宣慰使公署則在各地召集秘密會議，鼓勵各地土司頭人與地方菁英，向中國內地輿論揭發劉文輝與其部隊在西康地區的種種「暴行」，以詆毀劉文輝統治當地的正統性。<sup>43</sup>除此之外，諾那的武裝部隊亦扮演蔣介石在西康「打手」的角色，從 1935 年底起，即不時與當時仍盤踞在康藏邊界的紅軍交戰。而相較於劉文輝的第二十四軍以及其他四川大小軍閥，對圍剿紅軍採取陽奉陰違的態度，諾那的宣慰公署武裝部隊，事實上成為當時蔣介石在西南剿共期間，較能信任的主要武力之一。<sup>44</sup>

諾那呼圖克圖願意接受蔣介石的軍事、政治與財政資助，在中國西南與劉文輝及中共紅軍對抗，顯然有其私人企圖與野心。自 1928 年國民政府初成立起，他就刻意經營與蔣介石等南京高層的關係，並且多次公開表示他對於治理康局的看法，諾那更曾呼籲南京當局，應任命像他如此同時具有崇高宗教地位與地緣背景的人士，前去主政西康。<sup>45</sup>而另一方面，可以想見，劉文輝對於諾那呼圖克圖與「西康宣慰使公署」打著中央的旗幟，在其地盤內挖其牆腳的種種行徑，勢必無法忍受。劉曾屢次向國民政府抗議，卻得不到具體回應。1935 年底，駐在道孚、葛卡的劉文輝部隊，先後被諾那的武裝部隊繳械，劉文輝的第二十四軍在康北各縣的零星武裝，亦紛紛為宣慰使公署收編。在諾那的指示下，宣慰使公署竟然開始解除劉文輝先前在鄧柯、白玉、石渠、德格等縣份任命的地方官員職務，改派自己所信任的土司與頭人擔任縣長，接管地方行政事務。當諾那一行準備繼續在巴安一帶收繳劉文輝部隊武裝並接管地方政權之際，劉的部隊開始全力反擊。從 1936 年初起，劉與諾那之間

<sup>42</sup> 有關諾那在西康地區代表國民政府中央的公開宣慰活動相關報導，見《中央日報》，民國 24 年 10 月 22 日、10 月 24 日、10 月 25 日。

<sup>43</sup> 陳濟博，〈我所知道的諾那〉，《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 29 輯(1983)，頁 77-87。

<sup>44</sup> 〈諾那呈蔣委員長電〉（民國 24 年 12 月 13 日），編號 24021902；〈第十六軍軍長李韞珩呈蔣委員長電〉（民國 24 年 12 月 15 日），編號 24021905，《蔣檔》，〈積極治邊〉，第 4 冊。江安西、來作中、鄧俊康，〈諾那事變記略〉，《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 29 輯(1983)，頁 75-76。

<sup>45</sup> 有關諾那的治康意見，以及他對主政西康人選的看法，參見《蒙藏委員會公報》（南京），第 1, 2 期合刊（民國 18 年 5 月），頁 14-16。

的政治角力逐漸擴大演變為武裝衝突，兩方各不相讓，亦皆指控對方在康區的種種非法行徑，以及堅持自己的勢力在當地才具有代表性。<sup>46</sup>

除了劉文輝之外，西藏政府對於諾那呼圖克圖在西康地區的積極活動，亦同樣感到不安。趙爾豐在西南推動改革時，出身康區的諾那曾極力支持清軍，並號召當地喇嘛寺廟與土司、頭人供應糧餉，以助清軍進藏，使得十三世達賴喇嘛的政府自此與諾那交惡。1917 至 1918 年川軍與藏軍交戰時，諾那再度助川軍以對抗西藏，川軍戰敗後，諾那曾被押解至拉薩囚禁達數年之久，最後在 1924 年脫困逃到中國內地，並先後與北京政府及南京國民政府維持良好關係。<sup>47</sup>而諾那於 1935 年在南京的支持下回到西康，曾一度引起拉薩方面的疑懼，認為國民政府有意扶持諾那以對抗西藏，因而曾向蔣介石提出撤銷「西康宣慰使公署」的要求。<sup>48</sup>

諾那呼圖克圖與他的「西康宣慰使公署」，可說是蔣介石繼 1932 年格桑澤仁之後，再一次利用出身康區的政治宗教菁英，欲在西南邊陲建立立足點，並將南京的政令與影響力推進該地區。儘管引發西藏政府的疑慮和劉文輝的強烈反彈，為了使國民政府的影響力能夠逐漸打入中國西南，蔣介石仍願給予諾那呼圖克圖與他的派系儘可能的資源與最大的容忍。這也可以解釋為何連蔣介石的軍事幕僚在機密報告中，對於諾那與劉文輝在西康的公開軍事衝突都感到焦慮不安，並且向蔣警告提醒諾那本人所具有的強烈私人政治野心。

<sup>46</sup> 〈劉文輝呈四川行營顧祝同主任、蔣委員長函電〉（民國 24 年 11 月 28 日），編號 24021917；〈諾那呈四川行營顧祝同主任轉呈蔣委員長函電〉（民國 24 年 12 月 17 日），編號 24021908；〈李贊珩呈蔣委員長函電〉（民國 25 年 1 月 22 日），編號 25005226；〈顧祝同呈蔣委員長函電〉（民國 25 年 1 月 30 日），編號 25005219，《蔣檔》，〈積極治邊〉，第 4 冊。有關劉文輝與諾那在西康戰事的報導，另見《中央日報》，民國 24 年 10 月 21 日，頁 2。

<sup>47</sup> 〈諾那呼圖克圖行狀〉，《康藏前鋒》，第 4 卷第 1/2 期（民國 26 年 10 月），頁 8-10；*Who's Who in China: Biographies of Chinese Leaders, 5th edition* (Shanghai: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1932), p. 193.

<sup>48</sup> 〈西藏噶廈公所致蔣委員長函〉（民國 24 年 8 月 21 日），編號 42401；〈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蔣致余參議呈蔣委員長函電〉（民國 24 年 8 月 21 日），編號 42403，《蔣檔》，〈西藏問題〉，第 60 卷。在致西藏政府的回函裡，蔣介石向拉薩強調諾那回康旨在協助宣慰民眾，並無他意，希望拉薩方面毋「自生驚疑」。見〈蔣委員長致拉薩蔣致余轉西藏噶廈公所電〉（民國 24 年 8 月 30 日），編號 42402，出處同前。

時，蔣介石依然不願意撤銷對於「西康宣慰使公署」的支持。<sup>49</sup>只不過如同格桑澤仁的例子一般，南京利用諾那在康藏邊區的政權建構努力，最後仍以失敗收場。1936 年的 2 月，諾那受命在道孚、爐霍一帶糾結地方武裝與當地紅軍作戰時，被紅軍擊潰；公署武力隨後在甘孜對紅軍進行阻擊，又再次失利。諾那在逃往康南的巴安途中，在瞻對被當地與紅軍合作的土司俘虜，並送往甘孜的蘇維埃政權。同年 5 月，諾那在甘孜病逝，「西康宣慰使公署」也隨之瓦解。<sup>50</sup>

#### 四、南京與拉薩之間未能實現的軍事結盟

在西藏政府官員的認知裡，比起其他任何中國內地的漢人勢力與青康地區的軍閥政權，一個十分陌生且持無神論意識形態的中國共產黨，是要來得更加令其恐懼與不受歡迎。換言之，蔣介石的國民政府與拉薩方面，在剿匪與「反共」的政治議題上，事實上具有共同利益。<sup>51</sup>1935 年夏天，紅軍第一方面軍在毛澤東與朱德的率領下，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並且翻越大雪山，進入了康藏邊區。在得知紅軍勢力極有可能從康區向西進入西藏政府的轄境時，拉薩高層一度相當驚慌，除了開始在金沙江西岸不斷增兵之外，並曾向蔣介石試探，是否有採取聯合軍事行動以防堵紅軍的可能性。<sup>52</sup>在獲悉拉

<sup>49</sup> 〈顧祝同呈軍委會辦公廳朱培德主任轉呈蔣委員長函電〉（民國 25 年 3 月 5 日），編號 25005193；〈顧祝同呈南京軍事委員會函電〉（民國 25 年 2 月 21 日），編號 25005199；〈顧祝同呈蔣委員長函電〉（民國 25 年 1 月 30 日），編號 25005219，《蔣檔》，〈積極治邊〉，第 4 冊。江安西、來作中、鄧俊康，〈諾那事變記略〉，《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 29 輯(1983)，頁 65-73。

<sup>50</sup> 〈南昌行營秘書長楊永泰呈蔣委員長函電〉（民國 25 年 6 月 30 日），編號 25009087，《蔣檔》，〈積極治邊〉，第 4 冊；《中央日報》，民國 25 年 6 月 21 日，頁 3；周錫銀，〈諾那的部分重要史料輯錄〉，《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 29 輯(1983)，頁 91-94。

<sup>51</sup> 事實上，不但是西藏政府極端恐懼長征紅軍可能進逼康藏地區，英屬印度政府亦擔憂共黨勢力在當時將會蔓延並威脅到印度與緬甸北部一帶。見 IOR, L/P&S/12/4182, Memoranda by the Political Committee of India Office, dated July 7 and October 13, 1936.

<sup>52</sup> 〈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蔣致余致楊永泰函電〉（民國 24 年 6 月 11 日、6 月 16 日），編號 42366、42370；〈西藏熱振呼圖克圖暨司倫噶廈呈蔣委員長函電〉（民國 24 年 6 月 19 日），

薩高層提出由駐守金沙江的藏軍與中央軍相互聯絡以夾擊紅軍的構想後，蔣介石抱持肯定的態度，並將此訊息轉告其軍事部屬；此外，為了爭取拉薩的好感與協助，蔣介石亦特別電令青、川、康等各省當局，在「漢藏友好」的大前提下，嚴格要求各方格外保護藏民，且不得與邊境藏軍發生任何衝突。<sup>53</sup>

然而蔣介石欲與西藏政府在軍事上進一步合作以對抗長征紅軍的構想，卻遭到青海與西康軍閥勢力的強烈反彈。1935年8月間，在拉薩主動向蔣介石提出軍事結盟構想的兩個月之後，數千名已集結完畢的藏軍，在聲稱已經獲得蔣介石首肯的情況下，準備開拔前往甘孜地區，協助中央軍剿匪。當時亦有消息指稱，另一支藏軍部隊也將很快前往青海南部的玉樹地區，加入國軍追剿紅軍的行動，藏軍部隊領袖並同時向青海南部地方當局提出供應烏拉差役與糧秣支應等要求。這些舉動與傳聞，一時間驚動了駐守玉樹與甘孜地區的青海部隊，馬步芳與劉文輝立即分別向蔣介石提出強烈質疑，並且認為在不清楚拉薩真正動向之前，一旦貿然允許藏軍通過青、康部隊所駐守的防區，其後果將不堪設想。<sup>54</sup>面對西南軍閥對於國民政府與西藏部隊合作剿共的強烈異議，蔣介石一方面指示駐拉薩的蔣致余向西藏高層委婉懇切說明，希望藏軍暫時不要越過金沙江，以免造成青、康部隊的誤會，同時希望藏方在不大規模調動部隊的前提下，繼續與中央軍保持密切連繫。<sup>55</sup>另一方面，蔣介石則向劉文輝與馬步芳等人極力否認，曾經下令藏軍離開駐地追剿共軍，聲稱此一訊息「非出誤會，即係假託」。當馬步芳與劉文輝再次要求蔣介石明

<sup>53</sup> 編號 42372，《蔣檔》，〈西藏問題〉，第 60 卷。

<sup>53</sup> 〈楊永泰致蔣致余電〉（民國 24 年 6 月 13 日），編號 42367；〈蔣委員長致中央軍總指揮薛岳電〉（民國 24 年 6 月 25 日），編號 42373，《蔣檔》，〈西藏問題〉，第 60 卷。

<sup>54</sup> 〈蔣委員長致蔣致余轉呈熱振呼圖克圖暨司倫噶廈函電〉（民國 24 年 8 月 14 日），編號 42379，〈馬步芳呈蔣委員長函電〉（民國 24 年 8 月 15 日），編號 42382；〈蔣委員長致劉文輝函電〉（民國 24 年 8 月 15 日），編號 42383；〈蔣致余呈蔣委員長函電〉（民國 24 年 8 月 16 日），編號 42387；〈馬麟呈蔣委員長函電〉（民國 24 年 8 月 19 日），編號 42394，《蔣檔》，〈西藏問題〉，第 60 卷。

<sup>55</sup> 〈蔣委員長致蔣致余密電〉（民國 24 年 8 月 17 日），編號 42388，《蔣檔》，〈西藏問題〉，第 60 卷。

白表示，一旦藏軍果真渡過金沙江，該如何處置時，蔣最後不得不下令青、康部隊，屆時可以使用武力制止越界的藏軍。<sup>56</sup>國民政府與西藏之間，因「剿共」而建立起軍事合作關係的可能性，自此暫時被打消。

除了紅軍之外，當時另一股足以影響青康藏地區政治版圖與軍事安全的因素，是停留在青海地區的護送班禪喇嘛回藏「專使行署」。1933 年底，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之後，留在中國內地的九世班禪喇嘛，立即向南京表達希望返回西藏主持政教大權的意願。在國民政府的財政與軍事支持之下，一個配有數百名武裝兵力的龐大專使行署於 1934 年 6 月正式成立，準備經由內蒙古、甘肅與青海等地，回到西藏。<sup>57</sup>當時英屬印度政府對於班禪喇嘛欲在中國的政治與軍事支持下，經陸路跨越漢藏邊界回到西藏，抱持反對立場，並透過外交管道與國民政府交涉，希望班禪一行改走海路，由上海經印度回到西藏。英印政府此舉意在控制班禪隨員人數，藉以將國民政府官員入藏的人員減至最低，只不過英屬印度政府的提議，當時並不為南京所接受。<sup>58</sup>雖然西藏政府絕不願意讓中國漢人的勢力經由班禪返藏進入西藏，然而從宗教立場而言，卻無法拒絕這位在藏傳佛教傳統上僅次於達賴喇嘛的重要領袖回到西藏。因此拉薩雖然公開表明歡迎流亡中國內地的班禪喇嘛重回西藏，同時卻也宣稱藏軍將不惜一切代價，阻止中國軍隊以任何方式進入西藏境內。<sup>59</sup>

對國民政府而言，姑且不論班禪喇嘛一行能否突破英國與西藏政府的阻

<sup>56</sup> 〈馬步芳呈蔣委員長函電〉（民國 24 年 8 月 23 日），編號 42397；〈蔣委員長致馬步芳函電〉（民國 24 年 8 月 30 日），編號 42398；〈蔣委員長致劉文輝函電〉（民國 24 年 8 月 30 日），編號 42401，《蔣檔》，〈西藏問題〉，第 60 卷。

<sup>57</sup> 高長柱，〈西藏概況〉（台北：蒙藏委員會，1953），頁 51-65；Alastair Lamb, *Tibet, China & India 1914-1950: A History of Imperial Diplomacy* (Hertfordshire, England: Roxford, 1989), pp. 225-260.

<sup>58</sup> IOR, L/P&S/12/2279, *China: Annual Report, 1935*, pp. 7-8; Melvyn C.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pp. 252-309.

<sup>59</sup> 〈西藏駐京辦事處轉呈噶廈請班禪回藏勿隨帶漢蒙人等事致蒙藏委員會代電〉（民國 24 年 5 月 10 日）；〈蔣致余為報探詢噶廈對班禪回藏條件等事致蒙藏委員會電〉（民國 24 年 5 月 15 日），收入中國藏學研究中心、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合編（以下簡稱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等編），《九世班禪內地活動及返藏受阻檔案選編》（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2），頁 140、143。

撓回到西藏，南京直接支配的護送班禪喇嘛返藏的「專使行署」，事實上是將中央影響力帶入內蒙古與青海等廣大邊陲省份，並且對抗共黨紅軍在西南中國活動的一股重要力量。隨著班禪喇嘛沿途向廣大內陸地區的蒙、藏民族進行政教「宣慰」與反共宣傳，這個專使行署扮演起類似「西康宣慰使公署」的政治角色，成為國民政府對西南的青、康邊陲地區權力鞏固與塑造的重要催化劑。一個重要的例子是國民政府的「法幣」在邊陲省份的流通與使用。南京藉由班禪喇嘛與其專使行署經內蒙各省與青海等地返藏的機會，將其新推行的法幣推廣至各邊疆地區，此一策略最後達成了一定的成效。根據統計，到了 1937 至 1938 年之際，共有至少約 140 萬元的法幣在內蒙與青海流通，絕大多數皆是由班禪喇嘛行轅與其龐大隨從，首先自中國內地帶進去的。<sup>60</sup>由此看來，蔣介石與南京高層私底下是否真有強烈的動機，欲實現班禪喇嘛返藏，抑或是傾向於將班禪一行留在青海、西康地區，作為國民政府的一股勢力，仍有待進一步推敲商榷；<sup>61</sup>只不過 1934 年以來，南京公開支持班禪回藏的官方態度，也不可避免地成了蔣介石與拉薩之間，建立進一步合作關係的一個陰影。

青康藏高原地區各股勢力之間，極端錯綜複雜的互動關係與角力的結果，是 1936 年秋天起爆發了另一輪的邊界戰事。根據中文檔案裡西南軍閥向蔣介石所做的機密報告揭示，數千名藏軍於 1936 年 10 月起，開始渡過金沙

<sup>60</sup> 有關九世班禪喇嘛返藏問題，以及此與國民政府在內蒙古與青海等地的國家建構目標之間的微妙關連，見拙作，“A Reassessment of the Issue of the 9th Panchen Lama's Return to Tibet, 1934~1937,”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37: 2 (2003), pp. 129-154.

<sup>61</sup> 在一封民國 24 年 3 月間致蔣介石的機密信函裡，戴傳賢曾指出，班禪喇嘛若能夠長久駐留在青海地區，安定並收服廣大蒙藏人心，將是對國民政府日後統治邊疆地區最有利的局面。見〈戴傳賢致蔣委員長函〉（民國 24 年 3 月 20 日），《蔣檔》，〈革命文獻／統一時期／邊務〉，第 34 冊，頁 52-55。另一個透露出南京並非真的有意強行護送班禪一行返藏的跡象，是 1936 年 3 月，早在對日戰爭爆發的一年多前，南京就決定在青海的玉樹設立「西陲宣化使公署駐青康藏三邊辦事處」，準備讓班禪喇嘛一行長期停留在該地區，進行「宣化」工作。見〈誠允為准於玉樹設立西陲宣化使公署駐青康藏三邊辦事處請備案事致蒙藏委員會電〉（民國 25 年 3 月 7 日）；〈行政院准成立西陲宣化使公署駐青康藏三邊辦事處致蒙藏委員會指令〉（民國 25 年 3 月 20 日），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等編，《九世班禪內地活動及返藏受阻檔案選編》，頁 293、298。

江，與駐守江東德格、鄧科、石渠及白玉等縣份的青海部隊交戰，藏軍的攻勢迫使青海部隊撤出這些據點，而劉文輝的西康部隊則以「行軍困難急切」，無法赴援為由，與馬步芳兩人再度緊急向南京求援，希望蔣介石接濟彈藥軍餉，以應付康藏邊區的危局。<sup>62</sup>這一邊界戰爭的真相與發生的真正原因，至今仍不明確。英國官方文件指出，此次藏軍向西南中國軍閥部隊開邊釁的主要原因，是拉薩恐懼當時已離開康區的共黨紅軍，可能再回頭轉入西藏境內所採取的「自保」措施；英屬印度政府亦認為拉薩同時有意藉由此一軍事行動，向中國表達抗拒班禪喇嘛攜帶龐大中國衛隊返回西藏的決心。<sup>63</sup>南京國民政府高層與西南軍閥則傾向於認定西藏新一波的軍事挑釁行動，是英帝國主義在背後唆使，且與班禪返藏議題不無關連；馬步芳與劉文輝等人甚至主張，為了西南邊境的和平起見，班禪喇嘛應暫時留在青海或西康，待漢藏情勢好轉後再回拉薩。<sup>64</sup>然而西藏當局致國民政府的函電卻指出，藏軍渡江進駐德格、白玉等地，主要在於拉薩獲悉當地的藏商邦達昌家族分子，正陰謀勾結號召康區不滿拉薩政府人士，準備在金沙江以西拉薩所管轄的地區製造騷動與暴亂，因此藏軍出兵是在於「平亂」，西藏政府甚至聲稱在動員部隊之前，已先電告劉文輝與馬步芳知悉，並聲明無意與青、康部隊發生衝突。<sup>65</sup>1936 年

<sup>62</sup> 〈張學良轉呈馬步芳呈蔣委員長函電〉（民國 25 年 10 月 13 日），編號 25036695；〈翁文灝轉呈蔣致余、馬步芳、劉文輝呈蔣委員長電〉（民國 25 年 10 月 15 日），編號 25036694；〈馬步芳呈蔣委員長電〉（民國 25 年 10 月 20 日），編號 25024804；〈劉湘呈蔣委員長電〉（民國 25 年 10 月 27 日），編號 25025078，《蔣檔》，《積極治邊》，第 4 冊。

<sup>63</sup> IOR, L/P&S/12/2279, Foreign Office Annual Report, China: 1937, p. 20; Huge E. Richardson, *Tibetan Précis*, p. 64. 英國政府此一有關藏軍出兵乃欲阻止紅軍回頭的推論，吾人現在看來似乎並不具有強烈的說服力，但是在 1936 年之際，當一般外國政府幾乎無法窺知長征的真相與預測紅軍未來走向的情況下，英國官員會有如此的判斷，似乎也不足為奇。

<sup>64</sup> 「黃慕松呈行政院意見書」，附於〈行政院秘書長翁文灝致外交部函〉（民國 25 年 11 月 17 日），國史館藏，《外交部檔案》，〈班禪返藏案〉，檔號 172-1/0018。〈馬步芳為藏軍北犯請電班禪暫駐康青事致蒙藏委員會電〉（民國 25 年 11 月 2 日）；〈蒙藏委員會為擬定處理藏軍東犯一案辦法致行政院呈〉（民國 25 年 11 月），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等編，《九世班禪內地活動及返藏受阻檔案選編》，頁 356、359-360。

<sup>65</sup> 〈西藏駐京代表阿旺桑丹、格敦格典、圖丹桑結致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函〉，附於〈蒙藏委員會致外交部函〉（民國 25 年 11 月 26 日），國史館藏，《外交部檔案》，〈班禪返藏案〉，檔號 172-1/0018。

底的另一輪青康藏地區戰事，就這樣成了一場羅生門，包含著許多極其錯綜複雜的因素，也無法單純地把這些邊界戰爭放在「中英」或「漢藏」對抗此種分析架構下來加以看待。

## 五、抗戰爆發後青康藏地區的政治版圖重分配

1937 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後，日本全面侵華，蔣介石的國民政府被迫從南京遷往武漢，再撤退至重慶大後方；另一方面，1937 年 12 月，等待返藏的九世班禪喇嘛卻不幸病逝於青海玉樹，對於西藏政府來說，班禪喇嘛與中國漢人勢力結合回到西藏主政的威脅，也已經暫時消失。整個西南中國政治局勢因班禪圓寂與中日戰爭爆發急遽改觀，促成了 1938 年春天起，西康、青海與西藏政府間一連串和談會議的召開。首先是劉文輝與西藏政府於同年 5 月決定各派代表，就 1932 年以來懸而未決的大金與白利寺糾紛案展開談判。此一會議因故延至 1938 年 11 月間在德格正式召開，最後並達成了一〈安置良善大金僧規約詳細辦法〉，這份協定規定西康省政府有權對拉薩日後所任命的大金寺住持，行使最後同意權，同時也限制大金寺僧所能持有的武器數目；而拉薩方面則獲得劉文輝財政補助的保證，以修復遭戰火損毀的大金寺。<sup>66</sup> 青海馬步芳的代表與西藏政府官員則是在 1938 年 8 月間，於鄧科召開另一會議，最後並簽訂了〈青藏和好規則〉。依照此一協定，西藏政府必須撤回在 1936 年秋天軍事行動中駐守在德格、鄧科與石渠等地的兵力；此外，西藏各地方官員對於日後前往藏區旅行貿易的青海穆斯林商人，將負有保護的責任；而青、藏雙方的地方政府，在有公務必要時，亦有向對方當局途經的官員提供烏拉差役服務的義務。<sup>67</sup>

<sup>66</sup> 〈劉文輝致行政院長孔祥熙呈〉（民國 27 年 6 月 11 日），國史館藏，《行政院檔案》，〈青藏康藏會議〉，檔號 062/1213；〈行政院抄送西康省政府關於辦理大金白利案解決經過等情呈文致蒙藏委員會通知單〉（民國 28 年 3 月 25 日），《史料匯編》，冊 6，頁 2593-2601；IOR, L/P&S/12/4182, Report of the British Consulate-General in Chunking, dated January 7, 1939.

<sup>67</sup> 〈蒙藏委員會駐昌都調查員唐磊有關青藏和議經過之報告〉（民國 27 年 9 月 18 日），附於〈蒙

對日抗戰爆發之後，國民政府中央的勢力不可避免地將逐漸進入中國西南地區，這一趨勢必然對中國西南政局帶來新面貌。而在面對未來政治上的不確定性時，很顯然地，青、康、藏三方面都有意願在國民政府還尚未有能力插手介入此地事務之前，各自先進行和解，以重新確定彼此在該地的政治版圖，並對這個地區的政治、宗教與軍事資源進行重分配。這一事實可以從國民政府對於即將舉行的康藏與青藏會議，在事前竟然毫無所悉，獲得佐證。1938 年春，蒙藏委員會有意派遣高長柱，接替原駐藏辦事處參議蔣致余，<sup>68</sup>然而在尚未獲得西藏政府同意任命前，高長柱已先行動身前往青海，準備跨越青藏邊界，前往拉薩就職，高是在停留青海期間，才獲悉這些會議即將召開，並立即電告國民政府中央。<sup>69</sup>

當時行政院與蒙藏委員會對於青海與西康省當局將與西藏政府展開談判，以及談判的性質、日期與地點等，並不知情，直至去電詢問劉文輝與馬步芳之後，青、康兩省政府才回覆確有其事。<sup>70</sup>國民政府因而指示在青海等候入藏的高長柱代表中央，就近觀察並「指導」即將舉行的青藏談判，行政院並且要求馬步芳在與藏方談判過程中，務必把高長柱接替蔣致余的人事案，一併提出討論。國民政府中央欲在這些邊界談判當中佔有一席之地的企圖，

藏委員會致行政院呈》（民國 27 年 12 月 15 日），國史館藏，《行政院檔案》，〈青藏康藏會議〉，檔號 062/1213。

<sup>68</sup> 蔣致余是於 1934 年隨黃慕松使團入藏弔唁十三世達賴喇嘛，並於 1935 年 1 月接替病逝的劉樸忱，成為國府駐藏代表。民國 27 年 7 月，蔣致余以健康理由辭官，並逕自離開拉薩。他於任內在西藏的表現，評價不一，中外著作皆肯定他的積極工作態度，與對西藏官員的影響力。見喜饒尼瑪，〈民國時期中央政府駐藏職官芻議〉，《近代藏事研究》，頁 271-272；Alastair Lamb, *Tibet, China & India 1914-1950*, p. 273。然而根據中文檔案所揭示，蔣致余在拉薩的表現，卻是一開始就不為蔣介石所欣賞，甚至早於 1935 年蔣介石就要求蒙藏委員會將他從拉薩召回，他對蔣致余的評價是：「此人糊塗，久留必有害無益也。」見〈蔣委員長致蒙藏委員會黃慕松委員長電〉（民國 24 年 7 月 11 日），編號 42412，《蔣檔》，〈西藏問題〉，第 60 卷。

<sup>69</sup> 〈高長柱致行政院長孔祥熙呈〉（民國 27 年 5 月 20 日），國史館藏，《行政院檔案》，〈青藏康藏會議〉，檔號 062/1213。

<sup>70</sup> 〈行政院致蒙藏委員會函〉（民國 27 年 5 月 24 日）；〈蒙藏委員會呈行政院公函〉（民國 27 年 6 月 5 日）；〈行政院長孔祥熙致馬步芳、劉文輝電〉（民國 27 年 6 月 7 日）；〈馬步芳呈行政院長函〉（民國 27 年 6 月 9 日）；〈劉文輝呈行政院長函〉（民國 27 年 6 月 11 日），國史館藏，《行政院檔案》，〈青藏康藏會議〉，檔號 062/1213。

十分明顯。<sup>71</sup>只不過高長柱當時所能發揮的影響力相當有限，而馬步芳雖曾答允將駐藏官員一案一併向西藏代表提出，最後並無任何具體結果，高長柱終究未能跨越青藏邊界，前往拉薩履新。而當會議結束後，青、康兩省當局才把協定內容知會國民政府中央，國府也再一次必須事後被動地承認這些協定的有效性。以康藏之間的和約為例，國民政府甚至必須對西康省方提供部份財政援助，以實現劉文輝在會議中對西藏方面所做出的財政補助承諾。<sup>72</sup>

而 1938 年一連串青康藏會議對於西藏政府所帶來較為正面的結果，是真正實現了十三世達賴喇嘛在 1920 年代晚期與南京政府初接觸時，本來所期盼的局面，那就是結束自民國初年以來就緊張與衝突不斷的漢藏邊界危局，希望以邊界軍事上的平靜，來換取拉薩方面暫時的喘息。只不過這一邊境危機的解除，卻是在延宕近十年、西藏方面付出更多的軍事與政治代價、失去部份的康區領土，最後還是在蔣介石的國民政府中央未能插手參與的情況下所完成的，想必這大概也是當時已圓寂的十三世達賴喇嘛與西藏政府所始料未及的。

值得注意的是，青、康、藏地方當局在抗戰初期所進行的這一連串有關地方政經資源重分配的談判，也相當程度地影響了 1940 年代以後中國西南邊陲的政治版圖劃分，甚至因而確立了抗戰爆發後的西南地方軍閥，得以確保其在各自勢力範圍內的地位，不因國民政府的勢力進入四川而有所影響。而從本文的分析可得知，青海的馬氏家族很顯然地是一個贏家；在一連串與藏軍交手並獲勝之後，馬步芳的勢力進一步從青海向南延伸至康北地區，並且在 1940 年代以後，繼續在中國西北內陸與西藏議題上，扮演極為關鍵的角色，這包括尋找十三世達賴喇嘛的轉世靈童，與護送年幼的十四輩達賴自青

<sup>71</sup> 〈行政院致蒙藏委員會函〉（民國 27 年 6 月 7 日）；〈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呈行政院函〉（民國 27 年 6 月 28 日），國史館藏，《行政院檔案》，〈青藏康藏會議〉，檔號 062/1213。

<sup>72</sup> 〈蒙藏委員會駐昌都調查員唐磊有關青藏和議經過之報告〉，國史館藏，《行政院檔案》，〈青藏康藏會議〉，檔號 062/1213。〈內政部財政部蒙藏委員會核議安置大金僧規約及辦法並擬具意見致行政院呈〉（民國 28 年 4 月 27 日）；〈行政院核准關於安置大金僧規約及辦法所擬意見致蒙藏委員會指令〉（民國 28 年 5 月 13 日），《史料匯編》，冊 6，頁 2602-2604。

海返回拉薩坐床，處理新疆哈薩克遊牧民族南遷的問題，以及 1944 至 1945 年派兵前往新疆支援省政府平定伊犁事變等。<sup>73</sup>劉文輝雖然在 1933 年後失去四川版圖，卻得以在西康站穩腳步，並曾數次成功地阻止國民政府利用康區人士所進行的挖牆腳行動。而在 1938 年與西藏政府的關係獲得改善之後，1940 年代抗戰時期的劉文輝，更得以從日漸活絡的康藏地區貿易往來當中，獲取豐厚的商業利益。<sup>74</sup>另外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抗戰開始後遷都四川重慶的國民政府，到了 1941 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為止，還未能真正地在中國西南地區站穩腳步。嚴格而論，直到 1949 年國府轉進台灣為止，劉文輝、馬步芳乃至西藏政府，仍然牢固地統治著其各自的版圖。<sup>75</sup>

## 結 論

本文以 1930 年代發生在西南中國青康藏高原地區的戰事為主軸，嘗試對於這些軍事衝突的起因與本質做一探究，並且將這些邊界戰事，從近代中國西南邊政議題、中央與地方的權力競逐，與國民政府在邊陲地區政權鞏固等幾個角度來加以理解。而對於過去作品傾向於把發生在康藏、青藏邊界的衝突與戰事，單純地放在「漢藏衝突」或是「中國對抗英國帝國主義」的架構下來處理，或是把這些事件詮釋為中國中央力量對於收復西藏主權的努力，

<sup>73</sup> 有關民國時期的青海省以及馬步芳與國民政府的關係，參見：默利爾·亨斯博格(Merrill R. Hunsberger)著，崔永紅譯，《馬步芳在青海》（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

<sup>74</sup> 有關戰時康藏地區的貿易活動與劉文輝壟斷豐沛的商業利益，見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編，《抗戰時期的西南大後方》（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賈大全，〈川藏道的興起與川藏關係的發展〉，收入洪泉湖編，《兩岸少數民族問題》（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6），頁 71-88。

<sup>75</sup> 一個明顯的例子，1938 年四川軍閥劉湘病故後，蔣介石極欲以張群接替四川省主席，此一決定引起幾乎所有西南中國各個軍事與政治勢力的反對，最後蔣不得不撤銷此一命令，並且自兼四川省主席長達 14 個月之久。見陳雁暉，〈張群與川康經濟建設委員會〉，《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 29 輯(1983)，頁 188-199。有關當時蔣介石與川康軍事強人之間的互動，與西南政局的微妙情勢，亦為當時外國駐華官員所強烈關注。見 IOR, L/P&S/12/4182, Memorandum by the British Consulate-General (Chungking), dated August 26, 1939.

以及英帝國主義支持西藏以抗拒中國力量進入的看法，本文也提出一些不同的觀察角度，以期能夠對近代中國或西藏史研究，找出新的視野與方向。這一研究指出，1930 年代西南邊區的戰事，事實上反映出「戰爭」在近代中國政治與社會中所扮演的一種特殊角色，以及「戰爭」對於近代中國領土上不同政治勢力所能夠帶來的積極功能。1928 年甫創立的南京國民政府，期待康藏戰事與衝突所造成的混亂局面，能夠讓自己的勢力逐步滲透深入西南軍閥的地盤；青、康軍閥政權則企圖利用這些邊界衝突，擴大自己在西南邊陲的勢力範圍，同時塑造出捍衛中國邊疆領土主權的正面形象，藉以向南京國民政府「中央」索取更多的資源，並進一步確立自己政權的鞏固與合法性；西藏政府則是必須利用戰爭，以確保其在西南邊區的政教影響力與寺廟稅收來源，同時藉以轉移內部的注意力。三股勢力雖然有不同的目標，但卻都在「鞏固西南邊防」、「漢藏關係」、「邊疆議題」等政治語言的包裝之下，期待、利用並製造戰事的發生，以替自身爭取更大的利益。

1930 年代康藏、青藏戰事，與不同派系力量和軍閥間的武裝衝突，同時也代表著國民政府、西藏與川、康、青軍閥之間，在中國西南地區競爭資源與劃分政治、軍事版圖的一種過程。在這一過程當中，統治青海的馬氏家族是贏家，在與藏軍交戰並取得優勢後，馬步芳的勢力從青海向南延伸至康北地區，並得以在 1940 年代以後，繼續在中國西北內陸與西藏議題上，扮演關鍵角色。劉文輝雖然在 1930 年代初期因內戰失利而被逐出四川，卻得以在西康尋得政治生涯的第二春，並繼續統治這塊地區直至 1949 年。西藏政府在這場多方的權力角逐競賽當中，從 1918 年後有效佔領雅礱江以西的大片康區領土，到 1930 年代晚期失去了德格、白玉及鄧科等重要據點，最後還必須與青、康地方當局談判妥協，以保有該地區的傳統利益，就勢力範圍的控制與爭奪而言，可說是輸家。而國民政府「中央」，雖然自 1930 年代初期就開始利用這些戰事，以及其他種種因邊界戰事所帶來的名目，欲進一步對西南中國地區做有效控制，然而直到 1949 年國共內戰失利後被逐出大陸為止，其成效仍

有限，而劉文輝、馬步芳與西藏政府，仍然得以牢固地統治其各自的版圖。

英國外交檔案顯示，英屬印度政府對於十三世達賴喇嘛於 1931 至 1932 年在青康邊界發動戰事，感到十分不悅。對於藏方在戰事逆轉之後提出軍事支援的要求，英國亦未全然同意，只願在外交層次上向南京國民政府施壓，以期能夠早日停戰。此一事實也讓吾人對於民國時期中、英有關西藏問題的研究，有了一個新的觀察角度。1920 年代中期以後，英屬印度政府雖仍希望保有一個獨立自治不受其他強權干擾的西藏，然而戰事一旦發生，英印當局卻極為擔憂因支持拉薩政府而被捲入中國西南戰局。反倒是蔣介石的南京國民政府與西藏政府之間，在 1930 年代之際，事實上有許多充分的理由與共同利益，譬如「反共」、剿匪與削弱西南軍閥力量等議題，足以讓兩方在政治與軍事上建立起更進一步的合作關係。只不過因為許多種種複雜的因素，如班禪返藏議題與諾那在康活動等，讓這樣的一種結盟，終究無法真正實現。

## 徵引書目

### 一、檔案

國史館藏，《外交部檔案》，〈班禪返藏案〉，檔號 172-1/0018。

國史館藏，《行政院檔案》，〈青藏康藏會議〉，檔號 062/1213。

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文電／領袖事功／領導國家建設／積極治邊〉；〈特交檔案／政治／西藏問題〉；〈革命文獻／統一時期／邊務〉。

國史館藏，《閻伯川先生要電存錄》，〈北伐附三全會議及蒙藏事務案〉，  
檔號 202000013A，微捲號 90。

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 British Library, London: India Office  
Record, L/P&S/10/1088, L/P&S/10/1228, L/P&S/12/2279, L/P&S/12/4163,  
L/P&S/12/4169, L/P&S/12/4170, L/P&S/12/4173, L/P&S/12/4182,  
L/P&S/20/D222.

### 二、檔案匯編、文史資料選輯、地方志、報刊

《中央日報》（南京），民國 18 年至 26 年。

《中央週報》（南京，中國國民黨），民國 18 年至 25 年。

《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 29 輯，1983。

《青海三馬史料》編輯組，〈青藏戰事的內幕〉，《青海文史資料選輯》，  
第 14 輯，1985，頁 128-135。

《蒙藏委員會公報》（南京），第 1, 2 期合刊，民國 18 年 5 月。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合編，《九世班禪內地活動及返藏  
受阻檔案選編》。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2。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編，《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料匯編》，  
冊 6。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

孔慶宗，〈西藏插手西康大金白利糾紛的真相〉，《文史資料選輯》（合訂本），第 32 卷第 93 輯，1986，頁 98-115。

四川省康定縣志編纂委員會編，《康定縣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甘孜州志編纂委員會編，《甘孜州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甘孜藏族自治州概況編寫組編，《甘孜藏族自治州概況》。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

陳光藻，〈四川軍閥最後的一場混戰〉，《文史資料選輯》（合訂本），第 11 卷第 33 輯，1986，頁 85-94。

陳秉淵，〈馬麒在青海封建割據局面的形成及其建制〉，《青海文史資料選輯》，第 9 輯，1982，頁 13-51。

黃應乾，〈劉湘、劉文輝混戰始末〉，《文史資料選輯》（合訂本），第 11 卷第 33 輯，1986，頁 59-74。

蔡作禎，〈青藏戰役中我的經歷〉，《青海文史資料選輯》，第 2 輯，1964，頁 41-50。

### 三、專著

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編，《抗戰時期的西南大後方》。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方 勝，《從靈童到領袖——歷代班禪秘史》。北京：海南出版社，1996。

高長柱，《西藏概況》。台北：蒙藏委員會，1953。

喜饒尼瑪，《近代藏事研究》。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2000。

馮明珠，《近代中英西藏交涉與川藏邊情——從廓爾喀之役到華盛頓會議》。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6。

楊公素，《中國反對外國侵略干涉西藏地方鬥爭史》。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2。

楊策、彭武麟主編，《中國近代民族關係史》。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9。

- 劉曼卿，《國民政府女密使赴藏記實》。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
- 默利爾·亨斯博格(Merrill R. Hunsberger)著，崔永紅譯，《馬步芳在青海》。  
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
- Elleman, Bruce A. *Modern Chinese Warfare, 1795-1989*. London: Routledge, 2001.
- Goldstein, Melvyn C.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 Kapp, Robert A. *Szechwan and Chinese Republic: Provincial Militarism and Central Power, 1911-1938*.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
- Lamb, Alastair. *Tibet, China & India 1914-1950: A History of Imperial Diplomacy*. Hertfordshire: Roxford Books, 1989.
- Lary, Diana and Stephen MacKinnon eds., *The Scars of War: The Impact of Warfare on Modern China*.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01.
- Miller, Robert J. *Monasteries and Culture Changes in Inner Mongolia*.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59.
- Shakabpa, Tsepon W. D. *Tibet: A Political Hist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
- Sheridan, James E. *China in Disintegration: The Republican Era in Chinese History, 1912-1949*.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5.
- Strauss, Julia C. *Strong Institutions in Weak Polities: State Building in Republican China, 1927-194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Who's Who in China: Biographies of Chinese Leaders, 5th edition*. Shanghai: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1932.

#### 四、論文

- 〈諾那呼圖克圖行狀〉，《康藏前鋒》，第 4 卷第 1/2 期，民國 26 年 10 月，頁 8-10。
- 允 恭，〈藏軍何又侵康？〉，《東方雜誌》，卷 31 號 7，民國 23 年 4 月，頁 4-5。
- 王成組，〈西康建省〉，《東方雜誌》，卷 31 號 23，民國 23 年 12 月，頁 57-60。
- 張中復，〈中共早期民族政策之研究(1921-1949)〉，《西藏研究會訊》，期 12，1991 年 9 月，頁 3-10。
- 賈大全，〈川藏道的興起與川藏關係的發展〉，收入洪泉湖編，《兩岸少數民族問題》。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6。
- 頌 華，〈藏人反對英人的經濟侵略〉，《東方雜誌》，卷 26 號 10，民國 18 年 5 月，頁 8-10。
- 劉 君，〈簡論西康建省〉，《民國檔案與民國史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檔案出版社，1988。
- Lin, Hsiao-ting. "A Reassessment of the Issue of the 9th Panchen Lama's Return to Tibet, 1934~1937,"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37: 2, 2003, pp. 129-154.
- Rhodes, N. G. "The Development of Currency in Tibet," in Michael Aris and Aung San Suu Kyi, eds., *Tibetan Studies: In Honour of Huge Richardson*. Wiltshire, England: Aris & Philips Ltd., 1980.
- van de Ven, Hans. "The Military in the Republic," in Frederic E. Wakeman, Jr. & Richard L. Edmonds, eds., *Reappraising Republican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War, Power, and Frontier Politics: An Examination of Qinghai-Xikang-Tibetan Borderland Warfare in the 1930s

Lin Hsiao-ting<sup>\*</sup>

###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latively understudied Sino-Tibetan borderland warfare, as well as a series of armed conflicts that occurred among various political groups in southwest China, in the 1930s. Previous works tend to interpret these border wars and armed conflicts as the result of conventional confront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British or “British-supported” Tibet. Leaving aside this analytical framework, this paper views the Nationalist “Central Government” in Nanjing, the Tibetan Government in Lhasa, and the southwestern warlords, as three different and independent political groups, all of which sought to profit from various agendas, politically, militarily, and financially. By placing Nanjing, Lhasa and the southwestern warlord regimes in a wider historical context, this study also seeks to draw a clearer political landscape in southwest China in the 1930s by scrutinizing the implications of these border conflicts in terms of modern China’s state-building and regime consolidation projects. An interesting and politically ironic fact is that, during the 1930s, as the Nationalist Central government in Nanjing exercised little if any authority in southwest China, the Tibetan Government, the southwestern warlord regimes, and even the Guomindang itself, did not actually reject war to satisfy their

---

\* D. Phil. in Orient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Oxford; currently a Postdoctoral Research Fellow at th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and the 2004 Kiriayama Fellow at the Center for the Pacific Rim,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respective demands and further their political interests. As a result, what has traditionally been regarded as China's frontier and Tibetan agendas may present some new viewpoints that deserve careful reexamination.

**Keywords:** State-building, Dalai Lama, Warlord, Sino-Tibetan Relations,  
**Guomindang**